

# 瞿秋白〈多餘的話〉的 政治文化史

• 胡明輝

**摘要：**瞿秋白〈多餘的話〉從1937年在《逸經》上出現到1967年至1968年初作為《討瞿戰報》的主要攻擊對象，在這橫跨三十年的歷史中，經歷了極端刻意的政治使用與曲解。〈多餘的話〉這個文本所經歷的政治文化解讀，在二十世紀的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史中，具有獨特的位置與意義。本文將〈多餘的話〉的解讀分成四個階段，進行具體分析。第一階段（1937-1950）：在一個極為可疑的狀況下出版，國民黨將其當做反共宣傳，共產黨將其當做敵人的捏造。第二階段（1950-1964）：妾身未明，相關人物大多避而不談。第三階段（1964-1967）：慢慢成為歷史陰謀論的影射懷疑對象，作為「偽裝叛徒」的證據。第四階段（1967-1968）：《討瞿戰報》出版，被當做瞿秋白叛黨的鐵證，與〈李秀成自述〉一同被當做叛徒的告白，並開始被廣泛閱讀。

**關鍵詞：**瞿秋白 〈多餘的話〉 《討瞿戰報》 戚本禹 歷史陰謀論

在中國革命的最初階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中有一位面色蒼白的肺病患者，名叫瞿秋白。革命的歲月裏，他曾以超過一百個假名來隱藏自己的身份。隨着國民黨對共產黨發起血腥的「清黨」運動，瞿在1927年8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擔綱中共總書記<sup>①</sup>。1927至1928年間，他躍至其事業巔峰，在1928年7月於莫斯科合併召開的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六大中，更成為中共實際上的領導人之一。此後，他繼續作為斯大林的共產國際與中共領導層之間的中介人，並成為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家之一<sup>②</sup>。

除了作為一位職業革命家，瞿秋白也是一個具煽動性的作家。一如他那個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瞿也曾廣涉經籍、古文。在1931至1934年被逐

\* 感謝我的博士生陳文寧的熱心協助，也感謝華東師範大學樊建政老師以及三位匿名評審人的意見。

出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期間，瞿致力於揭露和攻擊中國的精英傳統文化。他將盛清時期(1683-1839)的士紳—商人階層定義為中國精英文化的主要社會代表，並對這一時期的藝術形式、文化遺產和知識取向進行了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批判<sup>③</sup>。瞿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學類型——筆者稱之為「為革命服務的新聞式寫作」，可見於其題為《亂彈》的論文集裏<sup>④</sup>。在這種文類中，瞿通過富於諷刺性和洞察力的議論豐富充實了自己的反精英論調，造就了1930年代的政治語言，繼而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共的文藝政策帶來深遠的影響<sup>⑤</sup>。

瞿秋白在1935年死前於獄中寫下〈多餘的話〉一文。本研究將展開〈多餘的話〉橫跨三十年在歷史中被解讀的過程，以它從1937年出現到1968年《討瞿戰報》停刊前的這段期間作為研究範圍。本文是一篇文本(text，即〈多餘的話〉)的歷史分析，並非對歷史人物(瞿秋白)的解讀與定位。瞿的歷史定位與中共的早期歷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是筆者將來繼續研究的議題。

文學史的研究者通常對這篇奇文的比喻、暗碼進行了各式各樣的解讀，政治史的研究者則把這篇文章當作瞿秋白的一篇自我告白。本文欲圖整合文學史與政治史的研究成果，從比較、綜合的方式對〈多餘的話〉在三十年間諸多歷史情境內所產生的不同解讀進行剖析。本文將〈多餘的話〉的解讀分成四個階段，進行具體分析。第一階段(1937-1950)：在一個極為可疑的狀況下出版，國民黨將其當做反共宣傳，共產黨將其當做敵人的捏造。第二階段(1950-1964)：妾身未明，相關人物大多避而不談。第三階段(1964-1967)：慢慢成為歷史陰謀論的影射懷疑對象，作為「偽裝叛徒」的證據。第四階段(1967-1968)：《討瞿戰報》出版，被當做瞿秋白叛黨的鐵證，與〈李秀成自述〉一同被當做叛徒的告白，並開始被廣泛閱讀。簡單來說，1964年前，大多數與瞿有所交集的人物都盡量迴避〈多餘的話〉；1964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多餘的話〉在一個非常特殊、非常極端的脈絡裏被利用，成為了「偽裝叛徒」的樣板<sup>⑥</sup>。筆者亦引進了一些新材料來討論文革前和文革時期策動歷史陰謀論的關鍵人物戚本禹在其中的作用。2016年《戚本禹回憶錄》的出版使筆者能將戚的活動與《討瞿戰報》聯繫起來。

本文點出，〈多餘的話〉在1937年的出現有着一個非常可疑、不確定的背景；除了陳鐵鍵與周楠本對〈多餘的話〉的歷史背景進行了仔細查證外，很少學者對其客觀分析過<sup>⑦</sup>。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瞿秋白的革命聲譽雖未受質疑，但如何評價〈多餘的話〉，卻一直妾身未明。〈多餘的話〉在1964年前被冷待的遭遇、1962年的重新出現、出現之後的高度爭議性，乃至文革中瞿被打成叛徒，這一連串過程必須被看作一個連續發展的歷史過程。

## 一 一篇可疑的文章

1934年7月，在國民黨區域的中共地下組織已被徹底清除，而江西蘇區的紅軍數目銳減。當中共面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時，中共中央委員會決定撤退。10月，約八萬六千名共產黨人突圍向西逸去，國民黨的地面攻擊和轟炸

尾隨不捨，將近半數的紅軍在幾周內命喪中途；11月，僅剩三萬餘人倖存。這次戰略性撤退在一片慌亂失措中邁向幾乎覆滅性的結局<sup>⑧</sup>。撤退之前，中共留下一小撮武裝力量在江西蘇區繼續游擊式抗爭，瞿秋白是其中之一。他希望能重返上海，回到妻子和朋友所在的地方。不幸的是，他在1935年2月23日被國民黨軍隊所虜，並在6月18日被處決。

1937年3月5日，瞿秋白的獄中回憶〈多餘的話〉在一份支持國民黨的刊物《逸經》上全文發表，據稱是來自一個國民黨官員的手抄本。至於這份手抄本是如何傳到《逸經》雜誌編輯的手上，已無人知曉<sup>⑨</sup>。儘管這篇文章的來源如此可疑，《逸經》不但予以發表，還將其定性為瞿最後的自白，更把它當作一種有力的反共宣傳品：「瞿秋白這篇『多餘的話』，實在不是多餘的，他在字裏行間，充分地流露了求生之意；這對於共產黨，要算是一樁坍台的事。」<sup>⑩</sup>儘管〈多餘的話〉現在多被認為瞿所撰，但當時已抵達延安的中共領導人基本上認為這不過是國民黨捏造的反共宣傳品<sup>⑪</sup>。

在瞿秋白被處決時，中共革命正處於低潮。國民黨繼續圍剿，力圖摧毀共產黨的軍事力量，當時大多數中西方觀察家普遍不認為共產黨可望逃脫國民黨的圍剿<sup>⑫</sup>。瞿的生命即將終結，也自然會對中國革命此時的潰敗重新作出思考反省。對瞿來說，中共在國民黨的圍攻下消亡，似乎將成為無法避免的定局。因此，瞿在〈多餘的話〉裏所呈現的，正是在中共幾近崩解邊緣的背景下，以其將亡之人的超然之心，訴諸風清雲淡的筆觸，做出的一個無可奈何的總結。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稱自己為一個缺乏政治敏感度的「文人」，坦承自己從來沒有鍛煉出一個真正革命者的鋼鐵意志，流連於理論思辨和世界革命的烏托邦世界，本不應該涉足一個手操生死、揮令政治的崗位，但他卻很不幸地被「放」到了這個位置上。瞿也談到了他的一些政治決策，但這些決定並未能起效<sup>⑬</sup>。他直認自己並不擅於革命鬥爭，然而在等待死亡之時，不忘向同志告別，惦記着那些被國民黨追剿的同胞<sup>⑭</sup>。〈多餘的話〉彷彿在宣告中國革命已經徹底失敗，是一份為了中國革命「枉拋心力作英雄」的將死之人的告別書。

〈多餘的話〉滿布着難以辨認的密碼、模糊不清的指稱，以及複雜難解的謎語<sup>⑮</sup>。它的爭議性，部分是由於出版的特殊情況，部分是因為文本自身的神秘性。瞿秋白的獄中回憶以一種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懺悔錄》(Confessiones)的形式書寫，帶有虛無主義的論調，像是一個如釋重負的人戲謔嘲諷自己的無能，瀰漫着自我懷疑和消沉情緒。準確地說，正是〈多餘的話〉的內部矛盾與諸種解讀的可能性，造就了隨之而來的、多方面的不同解讀<sup>⑯</sup>。

此外，〈多餘的話〉的風格並不像《亂彈》中的文章那樣簡明而富於戰鬥性。丁玲指出，〈多餘的話〉的風格使她想起1923年瞿秋白寫給她的信件，以及寫給她的密友、瞿的愛人王劍虹的私人信件，這種憂鬱的腔調和模稜兩可的自白是瞿真實但私密的文風<sup>⑰</sup>。丁也將瞿的私人信件描述為一種「像謎一樣」的文風，這恰恰也是〈多餘的話〉的風格<sup>⑱</sup>。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多餘的話〉中有一個隱喻，似乎受到列寧的〈論攀登高山〉影響：瞿將自己比喻為「一隻羸弱

的馬拖着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也暗示了一個悲劇的結局<sup>①</sup>。受挫於一連串的失敗和自己對中國革命條件的錯判，瞿在1935年被捕前就已身心俱疲。在如此危險、自我懷疑的時刻，瞿不僅承認了他的無能，也坦白了自己的疲憊。當年的雄心壯志，在他看來，完全是浪費生命。其獄中回憶的標題〈多餘的話〉，正反映了他將自己看作中國一個「多餘的人」，在生命終結前的結語<sup>②</sup>。

瞿秋白遭處決後不久，中國與世界的革命局勢發生了巨大的扭轉。不單中共得以倖存，毛澤東主義自1937年開始也迅速崛起。這一逆轉是國際大環境與歷史偶然性相結合的結果：西安事變、中日戰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形成新的國際政治格局<sup>③</sup>。瞿不可能預見使大勢得以扭轉的這些條件中的任何一個。自從他退隱上海後，除了在1931至1934年間被排除在江西蘇區的決策中心之外，也親睹了上海整個黨組織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逐漸瓦解的過程<sup>④</sup>，恰是〈多餘的話〉中那股無可奈何的情緒來源。

瞿秋白承擔着為中共的布爾什維克化思想作鬥爭的任務，對抗他所謂「中國知識份子的歐化」。〈多餘的話〉裏，瞿對世界政治的看法很顯然是受到中共的瀕臨失敗、世界革命的倒退，以及法西斯主義在全球冒起的影響而形成。對瞿來說，布爾什維克化意味着全球被壓迫人民不分國界得到解放；瞿基於自己就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對中國在世界革命中的角色和中國革命文學的理解與重新定義，成為了中共布爾什維克化努力的組成部分。像許多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一樣，瞿的知識背景和政治取態顯示出他並沒有照單全收共產國際的指導，而是根據他對中國革命優先性的理解，在各個關鍵時刻每每採取臨時行動。然而，國際主義仍毫無疑問是這些早期革命者的指導原則。在共產黨領袖的國際視野和性情氣質方面，瞿代表着早於毛澤東的那一代人，瞿與毛身處中共兩個不同的時間結構(temporality)中。瞿強調中國布爾什維克化革命的世界主義性格，不同於後來毛在集權階段形成的、中國艱苦抵抗日本入侵時發展起來的農民民族主義，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sup>⑤</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共的歷史以勝利者的視角被重寫，並被標準化一個朝向革命的、最終成功的、直線性的、不可避免的進化過程。最終，延安時期對親蘇幹部「錯誤路線」的批判在建國後得到繼承，布爾什維克化被貶低為一個充斥着錯誤和失敗的階段<sup>⑥</sup>。

## 二 第一次爭議與中共高層首次解讀

在建國之初的1950年代，瞿秋白被官方定性為中國革命的烈士和先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着手重建國家歷史時，瞿恰似許多早期的革命家一樣，被供奉在革命歷史的廟堂裏。正如政治史學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論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十年，中國共產黨重組了文化舞台，結果就是黨國機器成為了所有文化活動的主要資助者。這一重構的結果造就了一個

新的、由宣傳機構掌控的文化體制。宣傳機構享有重要的特權並且扮演着帶領群眾運動的重要角色。」<sup>②</sup>

在這樣一種以宣傳機構主導的氛圍中，瞿秋白和其他許多先烈一樣得到紀念，中共領導層甚至特別派人往中國西南部搜尋他的遺體。1955年，周恩來主持了瞿的官方葬禮，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悼詞，稱頌瞿為「中國共產黨的卓越的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同時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無限忠誠的戰士」<sup>③</sup>。這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瞿從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裏得到了應有的尊敬。

但是，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在1950年捲入了一場關於瞿臨死前狀態的爭論。當時剛剛離開台灣大學、轉入南開大學外文系任教的李霽野和人民出版社《新華月報》編審臧克家展開筆戰。1950年6月，李霽野寫了一篇題為〈瞿秋白先生給我的印象〉的文章，並在文末引用了瞿臨死前所寫的一首「集唐人句」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由於這首詩「鬼氣禪味」十足，臧克家立刻對這篇文章展開尖銳的批判：「這些東西決不可能出自一個革命烈士的筆下，它是敵人埋伏的暗箭，向一個他死後的『敵人』射擊。」他引述了《烈士傳》幾篇紀念文章中關於瞿死前的情形：「都不約而同的談到他在臨刑前高唱國際歌及紅軍歌，並大喊，『為中國革命而犧牲，是人生最大的光榮！』」並認為：「這才是和他雄壯的死、不朽的死合節的雄壯的詩、不朽的詩！這和『報紙』上所刊載的那些簡直不能相比！」最後，該文極力批評李霽野引述的詩：「那四句集詩，如果出自一個『坐化』的釋教徒還差不離。對於一個革命戰士，死，就是永生！至於『枉拋心力作英雄』，那簡直是『死』前懺悔低頭了。一個拒絕誘惑、以死殉人民事業的革命鬥士，會在這最後關頭否定了一切，連自己光榮的歷史也在內！這不但可能，而（且）情況恰恰相反的。」<sup>④</sup>

這首詩的風格和頹唐氣息與〈多餘的話〉完全一致。臧克家對李霽野的批判，現在讀來幾乎是為文革時對瞿秋白的叛徒解讀埋下了一個伏筆。革命烈士的壯烈形象，與這首詩格格不入。這當然是教條式宣傳僵化刻板的「革命英雄」形象的結果。但是，楊之華當時卻公開站在臧克家一邊，譴責李霽野，並不斷強調〈多餘的話〉是國民黨捏造篡改的一篇宣傳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53至1954年出版了第一套《瞿秋白文集》，楊之華對這套文集的出版費盡全部心力，出於其政治考量，〈多餘的話〉並沒有收錄在文集之中<sup>⑤</sup>。事實上，楊之華在1959至1962年間創作了《回憶秋白》，還是斷定〈多餘的話〉是敵人捏造的<sup>⑥</sup>。

1949到1964年間，由於楊之華堅持〈多餘的話〉並非瞿秋白所撰，〈多餘的話〉被冷待，這一時期所有與瞿相關的作品彙集和目錄，〈多餘的話〉都未收入其中，甚至對之隻字不提。在大多數瞿的故交和文化名人的懷念或追憶文章中，為了避免捲入與楊之華的爭端，〈多餘的話〉也被巧妙地迴避了，各人大多避而不談。〈多餘的話〉幾乎從宣傳機構控制下的所有出版物中銷聲匿迹<sup>⑦</sup>。因此，毛澤東直到1962年才第一次讀到在香港出版的〈多餘的話〉，並最終將〈多餘的話〉與文革直接聯繫起來（下詳）。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權的等級體制中，毛澤東的政治權威在大躍進後不再至高無上。根據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說法，大躍進的失敗在1962年已經昭然若揭，毛也因此放棄了這一方針，並打消了中國能在短時間內躋身超級強國的念想。毛在工農業方面的政策建議，都被修改甚至廢除。毛既對任何潛在挑戰者加以警惕和戒備，也對1959至1962年災難性的大饑荒後各地湧現的敗壞狀況，以及國家的前景真誠感到擔憂<sup>⑳</sup>。對毛來說，此時的糾結之處在於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如何回應他的願望。毛已經在1962年夏季重寫了國家的議事日程，他的同事雖是同意了，但仍會忠誠地追隨他嗎？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第一次反映了中共領導層內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他們的分歧基本上展現為兩種思維之間的內鬥：毛的烏托邦主義與劉的實用手腕<sup>㉑</sup>。二人的歧異首次在黨內公開展示，在接下來的數年裏毛和劉之間的裂痕持續擴大。毛同時也擔心劉可能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待自己蓋棺之日便會被全面顛覆一生革命奮鬥的成果<sup>㉒</sup>。

正是在這個如此關鍵的特殊時刻，毛澤東首次看到了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多餘的話〉被收入司馬璐所著的《瞿秋白傳》中。司馬璐1937年加入中共，1941年被開除黨籍，接下來將餘生都投入到反共的事業中。他於1962年10月在香港出版了《瞿秋白傳》，不過是一本120頁的小書，但是這本書的附錄〈多餘的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司馬璐的敘事也完全建立在〈多餘的話〉之上<sup>㉓</sup>。或許毛沒有察覺到〈多餘的話〉出版的環境，也不了解圍繞這篇文章的爭議，況且毛從來就不太喜歡那些素往支配過中國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和國際主義者<sup>㉔</sup>，因此，當《瞿秋白傳》被當作一種反共宣傳品而交到毛的手裏時，毛沒有多少閒暇去欣賞〈多餘的話〉中那些微妙的文意，卻一心想對〈多餘的話〉給出新的評價。

1964年，〈多餘的話〉在香港二次出版<sup>㉕</sup>。在人民大會堂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和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討論到這個問題。再讀此文之後，毛滿帶情緒地說：「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甚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甚麼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sup>㉖</sup>此處可見，毛澤東對〈多餘的話〉作出了情緒上的直接反應，夾雜了尷尬與不快。同年，周又一次作出了全面而系統的努力去找尋〈多餘的話〉的真實版本，也就是瞿秋白親手抄寫的稿本，在周生前雖一直稱未曾找到，但陸定一在文革後回憶道：「周恩來同志說，他看過《多餘的話》的真迹，確實是秋白的筆迹。因此，過去我說是假的，這話是錯的。」<sup>㉗</sup>然而，周最後不單完全放棄為瞿作辯護，反而積極「搞臭」他。

### 三 戚本禹歷史陰謀論的形成

進入文革前，〈多餘的話〉就已經開始從妾身未明的狀態變成不斷地被用作歷史影射的對象，進入文革時期後，這些影射的論點被《討瞿戰報》再三複

述。影射的方法基本上是製造一種歷史陰謀論，它的首倡者和幕後主角是一名年輕而激進的中共黨員戚本禹。1967年，戚於《紅旗》第五期上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sup>⑳</sup>，竄起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個理論家。直到1968年1月13日入獄，他的政治生涯才戛然而止。值得注意的是，討瞿的宣傳運動在戚竄起不久後啟動，並在他被逮捕後不久的1月15日突然結束；《討瞿戰報》正好與戚短暫的政治生涯相始終（下詳）。這種同步性絕對不是偶然。因此，接下來筆者將緊扣戚的政治生涯展開分析。

1960年代，黨內領導層出現如此激進的重構，發生在毛澤東逐漸年邁多病的時候。在1962年〈多餘的話〉於香港重浮檯面，引發毛對瞿秋白重新定性的同時，一場歷史論爭也引來毛關注，涉及的是太平軍中最後一名戰將李秀成。對〈多餘的話〉與李秀成的歷史改判，顯然是對提防偽裝叛徒的政治暗示。就像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革前的政治鬥爭中被挪用一樣，可以是一頂致命的「帽子」，隨之，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視為毛主義烏托邦觀點的國內修正主義者<sup>㉑</sup>。類似的歷史陰謀論陸續登場，但也需要有人提供理論上的基礎，戚本禹就在1963年發表了〈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這篇成名作<sup>㉒</sup>。

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召開前不久，毛澤東重拾他早年的閱讀興趣——太平天國起義史；戚本禹知道後也開始積極研究這段歷史。中共領袖對它懷有強烈的政治興趣，要將太平天國起義重塑為十九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先驅。通過將農民叛亂者改寫為革命者，將儒家精英描寫成資產階級反動份子，受中共影響的歷史學家致力於研究這些「革命先驅」如何由勝轉敗<sup>㉓</sup>。

羅爾綱在1937年憑着《太平天國史綱》的出版確立了其太平天國史專家的權威地位<sup>㉔</sup>。在其諸種著作中，羅寫過兩篇關於李秀成的文章。太平天國末年，洪秀全在1864年5月自殺，他信任的指揮官李秀成繼續抵抗曾國藩率領的湘軍。李不幸在7月為湘軍所虜，曾決定親審，這份審訊供錄被稱為〈李秀成自述〉，現存幾個版本。這些版本在上繳清廷前，全被曾和一些清朝官員篡改過<sup>㉕</sup>。羅在1951年1月出版了〈李秀成自述〉的相關研究成果《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並在1957年11月作增訂稿。這本書不僅確定了李的供述的真實性，也證明了其內容的準確性<sup>㉖</sup>。羅最後將李定調為「一個偉大集體主義者」、「中國封建時代被壓迫的農民階級的光榮」<sup>㉗</sup>。

當時戚本禹在中央辦公廳參加編輯《群眾反映》的工作，他依據羅爾綱的研究成果，在〈評李秀成自述〉中將〈李秀成自述〉重新定位成一部李秀成叛變投降的記錄。這一逆轉將李描畫為一個叛徒而非英雄，觸發了一場政治風暴。起初，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和很多學術界人物於1963年9月在中宣部集中討論。他們壓倒性地認同戚的作品「攻其一點不計其餘」。中央和各省市的報紙接到了相關信息，都不允許轉載戚的文章<sup>㉘</sup>。可是，江青在1964年春找到了戚，並轉達了毛澤東對他有關李秀成叛徒定位的讚揚和肯定。毛寫道：「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李秀成〕不終〔忠〕，不足為訓。」江傳達了毛對李的裁斷，鼓勵戚多研究一下如何對付叛徒，並透露：「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場

牽涉面很大的原則鬥爭啊！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叛徒呀！」<sup>④</sup>

戚本禹指出，李秀成被捕後寫的〈李秀成自述〉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李的一生應該根據其最後的叛徒行為而加以重新審視：「投降還是不投降，革命還是反革命，這是檢驗李秀成階級立場是否堅定的根本標誌……捨去了充滿李秀成自述裏的那些投降變節的話不管，只去埋首考證幾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國習慣的稱謂和用語，其結果就會把一個變節份子當成『曲線救國』的英雄」<sup>⑤</sup>，由此將〈李秀成自述〉與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背叛斯大林的判語聯繫起來。在江青的支持和毛澤東的鼓勵下，戚繼續順着這個問題意識，於1964年發表了一篇題為〈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的後續文章，認為歷史學家不該用李秀成一生的貢獻去為他最後的投降行為辯護：「一旦他投降變節了，那就等於他自己把自己開除出了革命隊伍，這時我們就不能再用評價革命人物的功過標準來評價他了。」<sup>⑥</sup>

戚本禹發表在《歷史研究》的上述兩篇有關〈李秀成自述〉的文章，肯定不是單純的歷史研究，基本上是為歷史陰謀論提供一個理論上的基礎。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從中領會到對蘇聯修正主義者和國內偽裝叛徒的批判和影射<sup>⑦</sup>。這套「忠誠與背叛」的陰謀話語涵蓋了文革啟動後的兩個主要意識形態論述。首先，紅衛兵普遍將這場運動理解為支持毛這位被叛徒圍攻的真正的先知。中共的集權化與毛的個人崇拜這兩條軌迹差不多是同時發展並行的，然而，在文革開始時，毛的個人崇拜又發生了新的變化，毛將自己展示為既是受害者又是先知的二重形象，要求民眾無條件地效忠他，並保衛他免遭那些偽裝叛徒傷害。其次，紅衛兵也將這場運動理解為針對偽裝叛徒，即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的攻擊，是一場反對任何毛澤東烏托邦路線的挑戰者的意識形態鬥爭。

在這個意義上，這場意識形態鬥爭充斥着反對陰謀叛亂的高調，並藉此製造一條模稜兩可的敵我分界線，滿布着基於農民民族主義和革命前帝制時期分辨忠奸的傳統中國式詞彙。可以說，這種論調也充斥在文革初期的揪叛徒運動中。

#### 四 〈五一六通知〉與揪叛徒運動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在於打倒劉少奇，其在1967年春發動的揪叛徒運動，也是服務於這個目的。文革期間最大的叛徒集團案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實際上還是針對劉的「華北幫」幹部。在全國奪權的混戰中，196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印發「華北幫」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批示說：「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幹的。」<sup>⑧</sup>〈多餘的話〉被捲入揪叛徒運動，是一個偶然的結果。甚至可以說，1967年《討瞿戰報》的出版是揪叛徒運動的一個插曲。



「揪叛徒」的話語來自文革中官方定調的兩條鬥爭路線：一條路線是毛澤東對共產主義的「正確」闡釋，而任何偏離毛主義的思想便成為了另一條路線。戚本禹就是毛主義的激烈捍衛者，並且攻擊任何修正主義者為叛徒；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與「走資派」相聯繫。文革很快就被界定為毛主義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路線與修正主義之間的路線鬥爭：前者肇始於大躍進集體化進程中極左路線的延續，後者則背離了大躍進的路線而不可避免地滑向資本主義。毛將最後的革命明確宣布為兩條主要路線之間的鬥爭<sup>⑤</sup>。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接着被轉化成一種「忠於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思想的叛徒」這兩極陣營，這種「忠誠與背叛」的論述延續了農民民族主義的傳統話語。因此，擁護並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紅衛兵就必須把這些叛徒給揪出來。

大多數歷史學家相信，這兩條路線的形成與文革同步：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全體一致投票通過發表所謂的〈五一六通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逐條反駁了幾個月前公布的〈二月提綱〉（〈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sup>⑥</sup>。這樣急劇的政治變化集中體現在《海瑞罷官》的爭議上。這部戲劇由時任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明史專家吳晗所創作。就如前述裴宜理指出，文革時期的文化體制被中共宣傳機構嚴格控制。所以，戲劇並不僅僅是戲言而已，它首先需獲得來自中宣部和毛澤東本人的批准與支持。時年僅三十三歲的姚文元贏得了毛的尊重和信任，發表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指出《海瑞罷官》是一個政治諷喻，旨在為失勢的彭德懷平反，而彭德懷曾經反對毛的大躍進。彭真既是政治局委員，更是劉少奇的重要盟友，當時草擬了〈二月提綱〉作為對批判《海瑞罷官》的公開運動的政治回應和防禦<sup>⑦</sup>。

剛開始，〈二月提綱〉似乎奏效，事態得到了控制。然而很快毛澤東就大舉發起對〈二月提綱〉的撻伐聲討。毛指控〈二月提綱〉的支持者，特別是彭真，是陰謀針對他的「反黨叛徒」，這些「反黨叛徒」竟然就隱藏在眾人的目光中，而且在中共黨內佔據着高位。其後發表的〈五一六通知〉將〈二月提綱〉完全翻了盤，對《海瑞罷官》的捍衛者進行了冷酷無情的譴責。為了突出這個戲劇性的轉變，毛將民間信仰中的宗教等級秩序融入到他的政治語言，這也是延續農民民族主義傳統話語的一種具體表現。比如說，將紅衛兵比喻為「孫悟空」擾亂天庭秩序並取而代之，呼籲更多的「孫悟空」起來擾亂天上的官僚體系<sup>⑧</sup>。毛又用了「閻王殿」來比喻中宣部，其領導彭真與陸定一就是「閻王」，民間信仰對於政府官員邪惡殘酷的觀感被用到了政治上。毛呼籲「打倒閻王，解放小鬼」<sup>⑨</sup>。在如此宣稱後，中宣部成了眾矢之的，毛便動員起群眾來將其推翻<sup>⑩</sup>。

〈五一六通知〉直接導致了名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這個激進班子的成立，其中包括了毛澤東的第四任夫人江青。中央文革小組頃刻擢為文革的指揮單位，其主要使命就是指導和操縱群眾運動。在1968年紅衛兵運動的巔峰，它實際上就是中共黨內的決策中心。〈五一六通知〉同時也決定了彭真和陸定一的命運，連同新近失勢的楊尚昆和羅瑞卿，這四個高級官員被打成「反黨叛徒集團」，並貼上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者標籤。這樣一步步地，毛和中央文革小組將自己與那些在大躍進失敗後決定驅動中國政府走向

務實和計劃性政策的中共黨內集團予以切割。與此同時，毛也將自己塑造成為能夠引領中國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未來的唯一先知<sup>⑤</sup>。

〈五一六通知〉飽含了多段煽動性的語言，實質上，它的理論根源也是歷史陰謀論——戚本禹為打造〈五一六通知〉的陰謀論語言做出了貢獻<sup>⑥</sup>。這份文件中一段文字後來在《討瞿戰報》中以大字體轉印<sup>⑦</sup>：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在這段引文中，歷史陰謀論清晰地得以表述，毛將赫魯曉夫作為危險的叛逆者點明了出來。〈五一六通知〉的表述與周恩來對〈李秀成自述〉和〈多餘的話〉的批評具有相似性，後兩者都被視為個人在臨死之前作出最後的投降行為，具有叛徒表徵；憑藉對〈李秀成自述〉的定性，戚本禹發展出一套叛徒的歷史典型論述，並在文革前後被頻繁援引。

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一場擴大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通過譴責瞿秋白，公開地支持毛澤東主導的歷史陰謀論，而真正的攻擊目標，是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像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前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一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狀就看出了。……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要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晚節不忠，一筆勾銷。」<sup>⑧</sup>這樣一來，周明確表示自己站在了毛的一邊<sup>⑨</sup>。

早在8月5日，毛澤東就貼出了他的第一張大字報，稱劉少奇背後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毛的大字報夥同其他學生領袖的張貼物，煽動北京學生起來造劉和中共領導集團的反。18日，數千名年輕的紅衛兵響應其號召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毛扮演了一個具超凡魅力的領袖，象徵性地發動了一場運動。就在毛對紅衛兵的動員後不久，周恩來在30日再一次公開談到<sup>⑩</sup>：

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資產階級，晚年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表現不好，晚年叛變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個報告，還未發表，紅衛兵知道了，就去八寶山公墓把碑給砸了……在知識份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樣，晚年變節了……瞿秋白被敵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後還是被國民黨殺掉了。

他通過重複對瞿秋白和李秀成進行指控和譴責，間接地鼓勵了紅衛兵造反，後來紅衛兵兩次前往八寶山公墓搗毀瞿的墳墓<sup>⑪</sup>。一場更加系統地對瞿的討伐已蓄勢待發。

與此同時，劉少奇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被降級。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被列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被迫檢討自己的錯誤，他們的檢討其後被印發全國。1967年1月，毛澤東正式免去了劉的國家主席和中央委員會委員職位。經過這一系列的精心策劃，劉的政治生命結束了，其後於1969年11月12日去世<sup>66</sup>。

劉少奇的垮台碰巧遇上了上海「一月風暴」，紅衛兵廢黜了在這座城市掌權的黨委。根據毛澤東對文革得以展開的解釋，就是「奪權」<sup>67</sup>。然而，隨着毛鼓動揪叛徒運動這樣的歷史陰謀論，促使中共各級官員、幹部成為被恣意奪權的對象，中央文革小組已隨之完全失去對紅衛兵運動的控制。對中共官僚的隨意攻擊和紅衛兵中的派性鬥爭在全國範圍內爆發，導致整個中國都陷入集體暴力的泥潭裏。全國各地都有肆意揪叛徒的案例，短短的幾個月中幾乎到了完全失序失控的地步<sup>68</sup>。在北京，紅衛兵將自己武裝起來，相互傾軋。這場派系之間的武鬥在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的《斷裂的造反：北京紅衛兵運動》(*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中有所分析。他認為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毛的個人超凡魅力，試圖為這種政治動員尋得一個社會學的合理解釋<sup>69</sup>。

筆者在這裏提供一個意識形態分析，解釋周恩來將〈多餘的話〉與〈李秀成自述〉聯繫起來的意識形態目的。毛澤東的歷史陰謀論的基本邏輯如下：代表中國共產主義未來的偉大舵手和先知毛主席正被不勝其數的「中國的赫魯曉夫」圍攻，這些偽裝叛徒已經擴散到黨和國家的機構中，中國的共產主義也陷入存亡危機。周之所以將毛的個人崇拜與歷史陰謀論相結合，是因為周敏銳地察覺到，由於年輕人對毛的個人崇拜，使他們能夠輕易地接受將〈多餘的話〉與〈李秀成自述〉解釋成一種叛徒的自白。揪叛徒的重要工作，就具體成為如何偵察偽裝叛徒的陰謀，要在偽裝叛徒叛變之前，將他們抓出來。

〈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對偽裝叛徒的認定，類似於對尚未審訊的「罪犯」作出有罪推定，事後證明深具破壞性。筆者主要關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偽裝叛徒的敘事是如何拼湊而成的，即偽裝叛徒的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筆者的解釋方法不同於魏昂德的社會學解釋，但有望可加強他對此現象的解釋：中央文革小組直接動員的努力得到了自願而廣泛的積極響應，甚至當紅衛兵造反派內鬥不止、他們的聯合支離破碎時，也多未曾對此意識形態有所質疑。

## 五 《討瞿戰報》與偽裝叛徒敘事

在全國奪權的失序失控狀態中，《討瞿戰報》正式創刊，〈多餘的話〉成為該報的中心焦點。〈李秀成自述〉充作平行案例被多番引用，毛澤東對李秀成的案語「白紙黑字，鐵證如山」，也反覆套用在瞿秋白的身上。本文所討論的三個政治文化要素——上層權力鬥爭、歷史陰謀論、揪叛徒運動，在《討瞿戰報》得以具體和全面體現。

1967年初，在紅衛兵展開全國奪權之時，中央文革小組開始系統地借助偽裝叛徒敘事來發動揪叛徒運動。3月初，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陳伯達和康生發動了一場批判劉少奇所撰政治小冊子《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宣傳運動。20日，戚本禹向毛澤東遞交了新的宣傳草稿，題為〈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毛在草稿上附添了大量評論和修改，把它交給中央文革小組集體討論，最後文稿在《紅旗》上發表，並通過全國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等報刊轉載，傳達各地。在這篇文章裏，戚基本完成了偽裝叛徒的歷史形象建構，並演示了它如何應用到「走資派」身上：「你〔「走資派」〕根本不是甚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打倒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黨、篡國。」<sup>①</sup>根據毛的理解，〈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發表，標誌着文革中意識形態鬥爭一個新的也是最後的階段<sup>②</sup>。

大約於同一時間，討瞿運動正式打響<sup>③</sup>。一群來自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的紅衛兵，舉行集會並宣告成立討瞿大隊。這一號召得到北京市法院紅色革命造反總部的響應。在北京眾多紅衛兵派系中，討瞿紅衛兵的基層組織直接由中央文革小組掌控<sup>④</sup>。他們的出版物《討瞿戰報》在各省廣泛流傳，並引發了青年紅衛兵意想不到的反應。

《討瞿戰報》共二十二期，首期出版於1967年5月6日，末刊則是在1968年1月15日。如前所述，這一年不到的短暫時間，也正好是戚本禹進入中央文革小組的階段。更重要的是，「討瞿大隊剛剛成立，就得到了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謝富治、戚本禹、李震等中央首長的熱情關懷和堅決支持」<sup>⑤</sup>。討瞿大隊本就囊括幾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領導，自然由他們擔負起這場運動的領軍角色；戚是討瞿運動的幕後主事人，並對《討瞿戰報》產生了重大影響<sup>⑥</sup>。根據戚在被捕後的交代，他被委以討瞿宣傳的重任，是因為前述那兩篇對李秀成作出歷史研判的文章。他聲稱「不忍心討瞿，只叫下邊人草草弄了一個材料敷衍了事」<sup>⑦</sup>。1967年5月，周恩來遭到了江青的指控，江利用偽裝叛徒敘事的狂熱試圖扳倒周；周勉強從這場致命的危機中脫身，但肯定感受到了該敘事方式的力量<sup>⑧</sup>。周後來贊成並積極推動支持討瞿運動應並非巧合，而是為了利用同樣的敘事，洗清自己的嫌疑。

在1967至1968年間，北京和上海都出版了許多紅衛兵小冊子，它們的格式非常相似<sup>⑨</sup>。《討瞿戰報》也不例外：如引用毛澤東、周恩來的話作為最高指示，加上幾篇標題清晰又煽情的短文。這些小冊子很明顯是供紅衛兵基層組織團體作討論的宣傳物，讀者年齡段從十二歲到二十歲不等，多包括問答欄目及讀者來信。它們一般不是思考縝密的論述，多為說教性質，用來強化特定的論點，又或是攻擊特定的目標。顯然，《討瞿戰報》是文革紅衛兵奪權期間宣傳材料標準化印製進程的一部分。

《討瞿戰報》雖與大部分紅衛兵奪權期間宣傳材料的格式類似，但如前所述，它畢竟是由中央文革小組掌控的一種出版物，使其有別於當時混亂失控、奪權武鬥不斷的各個紅衛兵黨派的出版物。大部分紅衛兵黨派的出版物是地方性的，流通不廣，而《討瞿戰報》的出版持續了大約九個月。在這麼

短的時間裏，該報卻能成為一種流通全國的出版物，發行量持續增加。根據《討瞿戰報》第七期的簡短聲明，該報人員將印製範本（「紙型」，類似於中國傳統的印刷木板）帶到各個地區，在當地印刷以便得到更廣泛的傳播<sup>⑳</sup>。根據另外一件軼事記錄，《討瞿戰報》在主要城市的各個售報處都有出售，可見流通之廣<sup>㉑</sup>。

1967年10月，《討瞿戰報》編輯部收集了該刊所有的宣傳材料，把它們編輯成一個新的集子，題為《討瞿：徹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資料彙編》。1968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批判集》提供並發表了更多詳細的補充性材料。〈多餘的話〉在討瞿運動中繼續流傳，並成為中國歷史上閱讀範圍最廣和最有影響力的文本之一<sup>㉒</sup>。

《討瞿戰報》在內容上是教條式的，單獨挑出瞿秋白作為偽裝叛徒的典例，並擇取了高度通俗簡練的語言來譴責瞿及其〈多餘的話〉。其敘事邏輯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完全一致，運用了同樣的偽裝叛徒敘事。頭三期的邏輯如下：（1）明確帶出前提：「瞿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和叛徒。」（2）提出問題：為甚麼這麼多黨員頌揚瞿是英雄和烈士？（3）那些讚揚他的人也呈現與瞿相類的叛徒觀點，因此他們只是偽裝成毛澤東主義者。（4）因此，那些推崇瞿的人一定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偽裝叛徒，他們必須被揭露、懲罰、驅逐。一個潛在的修正主義者和叛徒的名單（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由是制訂，所有涉案者都遭受迫害<sup>㉓</sup>。

縱觀而言，《討瞿戰報》悉盡其力於詆譏瞿秋白是一個偽裝叛徒，四條宣傳的主線貫穿該報各期。創刊號有文章題為〈瞿秋白是一個大叛徒〉，提出如下質問：我們應該怎樣處置叛徒？這些叛徒何竟得以偽裝成同志？我們怎樣吸取歷史教訓來清除這些偽裝叛徒<sup>㉔</sup>？正如第三期社論標題宣稱的，解決方案簡單而斷然：「徹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sup>㉕</sup>。煽動性的語言主要是為了鼓動紅衛兵的暴力行徑，鼓動他們的邏輯必須清楚簡單、不易產生誤解，同時文字也不能太長。

《討瞿戰報》以影射的方式指出，李秀成和瞿秋白行至生命的終點，都做出了同樣的叛變行為：他們都失去了最後的堅持，背叛了終極的政治承諾。為了進一步鼓動紅衛兵，該報將李和瞿都塑造成沒能堅持到底並最終變節的機會主義者<sup>㉖</sup>。李和瞿之間的類比，背後毫無疑問有戚本禹的無形操縱。戚對於〈李秀成自述〉的分析，被逐條與瞿的〈多餘的話〉相對比<sup>㉗</sup>。《討瞿戰報》上對〈多餘的話〉的批判，基本上衍生自戚對於李如何變成叛徒的敘述。儘管這兩個真實的歷史人物處在極其不同的歷史環境，他們都在自己無可避免的死亡前，面臨着同樣困難而複雜的抉擇，該報仍強烈地暗示他們在最後時刻作出了錯誤的選擇<sup>㉘</sup>。

在《討瞿戰報》中，瞿秋白的一生被刻意描寫成從「假革命」走向「反革命」的轉變。以瞿的最後行徑作起始點，該報將他的「反動性格」追溯到其作為「機會主義者」的早期生涯，認為他加入中共只是為了利用革命形勢獲取眼前的利益，而不是始終如一地被共產主義原則和藍圖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有關李秀成供詞的案語「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曾由江青轉達給戚本禹，又

被移花接木到《討瞿戰報》中。同樣的判詞，之前是用於描述李的供述，當時被用來判決〈多餘的話〉<sup>⑧</sup>。〈多餘的話〉成了瞿作為叛逆中共的「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根據《討瞿戰報》，瞿秋白生平還犯了其他的錯誤：(1) 瞿對義和團運動持相當負面的態度<sup>⑨</sup>；(2) 瞿給他的情人和妻子寫的信件表現出「精神頹廢」<sup>⑩</sup>；(3) 瞿寫了〈多餘的話〉<sup>⑪</sup>。前兩項看起來是勉強找出來充數用，該報主要的批評對象還是〈多餘的話〉。通過該報所能提供的僅有細節來判斷，這個清單便是他們所能揪出來醜化瞿的「一切證據」。因為瞿是中共成立過程中一個如此多變和矛盾的人物，受到格式和讀者限制的《討瞿戰報》，只能生搬硬套歷史陰謀論式說教的口號。《討瞿戰報》僅僅只是針對年輕人的政治宣傳，瞿所身處的世界和歷史真相不是該報關注的重點。

討瞿紅衛兵繼續響應中央文革小組的號召，積極收集更多的證據。於是他們決定採訪黨內的老人郭沫若和茅盾，他們都是1920、30年代的重要作家且曾是瞿秋白的同事。面對紅衛兵肆意攻擊故交黨友的強大壓力，加上對自身的處境也感到相當膽戰心驚，他們知道自己不應為瞿說任何好話，但又知道不能胡編亂造。結果就是，兩人給《討瞿戰報》提供了一些模糊不清的誤導性細節。

《討瞿戰報》的創刊號刊載了一封瞿秋白於國民黨牢房裏寫給郭沫若的信件<sup>⑫</sup>。記者還就此在1967年5月18日訪問了郭。訪談中，郭首先承認了這封信的真實性。信中描述了1927年國共分裂前夕，郭與瞿一起吃晚飯並喝白蘭地酒，表現出豪性、快樂與瀟灑，反映兩人之間關係的親密。郭小心地解釋兩人在1927年只會晤過三次，故意淡化了兩人的交往程度，並澄清信中內容並不意味着他們是親密的朋友<sup>⑬</sup>。茅盾在該報對他的採訪中使用了同樣的策略。茅盾提及瞿在升為中共總書記時，回想起1927年瞿和陳公博飲酒達旦。陳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但後來離開了中共為汪精衛效力，官方歷史照慣例把陳打為黨的叛徒。此事也許是真實的，但茅盾以此暗示瞿也是叛徒，因為他在國共分裂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卻浪費時間去和一個叛徒飲酒作樂。此外，茅盾也評論了〈多餘的話〉，認為儘管瞿在文中表達了虛無主義觀點和對於政治的反感，但實際在政治上卻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殘忍之人。茅盾又暗示瞿的野心也許正是他最後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並屈膝投降，以圖在國民黨內獲得生存的緣由所在<sup>⑭</sup>。

順着毛澤東「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的邏輯，《討瞿戰報》在第五、六期合刊全文發表了〈多餘的話〉<sup>⑮</sup>。很諷刺的是，該報看待〈多餘的話〉的方式，竟和國民黨將它視為反共宣傳品的方式驚人地相似。然而，這兩種教條式解讀，與個人讀該文所獲得的真實閱讀體驗相比，顯得蒼白無力。儘管〈多餘的話〉被當作瞿的背叛證據，既刊於中央文革小組主導的《討瞿戰報》，後來又被官方的人民出版社以小冊子形式單獨發行，但全國性宣傳的結果是，〈多餘的話〉第一次被公開而廣泛傳閱。〈多餘的話〉自從1937年面世以來，一直處在妾身未明的狀態，文革前則是影射叛徒的對象。突然間，因着《討瞿戰報》的

大量發行，〈多餘的話〉被手抄、重印，為文革期間新一代的年輕讀者傳播和閱讀，並且在那個暴力無常的歲月裏流傳着<sup>⑥</sup>。

## 六 結語

本文透過文革前和文革時期偽裝叛徒敘事如何被布置運用的知識史，詳究了瞿秋白及其〈多餘的話〉被捲入當中的一段歷程。其中，筆者強調了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歷史陰謀論的首倡者戚本禹在其中的作用。戚在發表了兩篇對〈李秀成自述〉進行研判的文章後，正式走上政治歷史舞台，這兩篇文章也成了文革前影射偽裝叛徒的一個標準案例。戚利用〈李秀成自述〉進行歷史影射以形成其歷史陰謀論；毛澤東也開始挪用戚的分析，用李秀成來影射當時被其指控為蘇聯修正主義者的赫魯曉夫。〈多餘的話〉在文革初期也因而成為了揪叛徒運動的歷史根據。

深受戚本禹影響的《討瞿戰報》在1967年全國奪權、失控失序的狀態下粉墨登場，該報的要務就在於確認瞿秋白是一個偽裝叛徒，再以他的例子來揭發其他偽裝叛徒，其內容結合了文革中的三個政治文化要素——上層權力鬥爭、歷史陰謀論、揪叛徒運動。從李秀成到瞿秋白，再轉至劉少奇，中共通過偽裝叛徒這種敘事方式進行對歷史記錄微妙而激進的重塑，構成文革期間毛澤東所謂的「意識形態鬥爭」。諷刺的是，文革期間對〈多餘的話〉的大量傳播，使這個文本成了整整一代年輕人普遍的文化參考坐標<sup>⑦</sup>。

### 註釋

① 楊奎松：〈瞿秋白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頁95-98。瞿的俄語化名 Strachov 已經得到確認。參見 RKP(B), *Komintern und die national-revolutionäre Bewegung in China: Dokumente*, vol. 1, 1920-1925 (Paderborn: Schöningh, 1996), 862。

② 楊奎松：〈瞿秋白與共產國際〉，頁98-101；Nick Knight,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From Qu Qiubai to Mao Zedong, 1923-1945*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67-68。

③ 這種批判在《亂彈》裏俯拾皆是。參見瞿秋白：〈代序〉（1931），載《亂彈》，收入《亂彈及其他》（臨沂：山東新華書店，1949），頁1-4。關於《亂彈》的版本，參見《瞿秋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瞿秋白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頁252，註釋1。瞿秋白應該屬「批判性反傳統主義」的典型人物。參見 Yu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溝口雄三：《中國の衝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頁141-205。

④ 筆者用「為革命服務的新聞式寫作」一詞來特指「雜文」這一由瞿秋白和魯迅同時使用的文類。李歐梵認為魯迅的雜文是「創造性的寫作」，並且高度讚揚它為「戰鬥性的論爭性的」文章。參見 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0-29。亦可參見 Gloria Davis, *Lu Xun's Revolution: 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8-81。

⑤ 瞿秋白提倡「大眾文學」，即用工人和農民的口語寫故事，在1942年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可以看到。關於瞿的貢獻和毛的延安談話之間的聯繫，參見 Paul G.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ü Ch'iu-pai*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222-42; Merle Goldman and Leo Ou-fan Lee, ed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12-14。

⑥ 《討瞿戰報》上不乏關於「偽裝」、「叛徒」的敘述，如『『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撕破頂着三十多年『烈士』桂冠的大叛徒、老牌的機會主義份子瞿秋白的畫皮。』參見〈徹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討瞿戰報》，第3期（1967年6月5日），第1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討瞿戰報》創刊號（1967年5月6日）至第22期（1968年1月15日），由北京政法學院（1983年更名為中國政法大學）革命委員會的編輯部出版。

⑦ 陳鐵鍵：〈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外曲內直燭照心靈的《多餘的話》〉，載瞿秋白：《多餘的話》（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頁1-65；周楠本編：《多餘的話：瞿秋白獄中反思錄》（台北：獨立作家，2015），頁28-32。

⑧ 筆者指的是紅一方面軍，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突圍時相對完整，軍人和槍械較多。兩軍後來在四川省邊界附近的懋功會師，但是在「連接國際力量」的戰略決策上有所分歧，領導層發生了分裂。參見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3-25。

⑨ 陳鐵鍵推斷，〈多餘的話〉的提供者是曾任福建蔣軍政治工作人員的楊幸之。參見陳鐵鍵：〈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頁8-9。一般認為《逸經》於1937年首次刊發〈多餘的話〉全文。參見〈關於大叛徒瞿秋白寫《多餘的話》的材料〉，《討瞿戰報》，第5、6期合刊（1967年6月29日），第8版。

⑩ 雪華：〈多餘的話·引言〉，《逸經》，第25期（1937年3月5日），頁18。

⑪⑫ 陳鐵鍵：〈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頁8-19；26。

⑬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35-39.

⑭ 劉福勤將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所提到的歷史事件對照史料做了扼要的分析。參見劉福勤：《心憂書〈多餘的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頁132-52。

⑮ 瞿秋白：〈多餘的話〉，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第七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頁711-13；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9-11。

⑯ 陳相因也認為，〈多餘的話〉「置入諸多符碼來多層次地遮掩／彰顯其政治動機與目的，展演一個矛盾、豐富且多面貌的自我」。但是，文中提及攀登高山的馬的比喻並不在她的分析中。參見陳相因：〈「自我」的符碼與戲碼——論瞿秋白筆下「多餘的人」與《多餘的話》〉，《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4期（2014年3月），頁135。

⑰⑱ 參見丁玲：〈《多餘的話》〉，載《丁玲文集》，第五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107-108；107。

⑲ 丁玲：〈謎似的一束信〉，載《丁玲文集》，第五冊，頁98-101。丁玲早於1939年便於香港發表了首篇評論〈多餘的話〉的文章〈與友人論秋白〉，但這篇文章並未收入《丁玲文集》和《丁玲全集》。張歷君首先論及丁玲這篇文獻，參見張歷君：〈歷史與劇場：論瞿秋白筆下的「滑稽劇」和「死鬼」意象〉，載樊善標、危令敦、黃念欣編：《墨痕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頁318-19。

⑳ 瞿秋白：〈多餘的話（續）〉，《逸經》，第26期（1937年3月20日），頁16；Tariq Ali, *The Dilemmas of Lenin: Terrorism, War, Empire, Love,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2017), 339-41。筆者推斷瞿秋白讀過這篇列寧的文章並在〈多餘的話〉中有所借用。

㉑ 根據筆者的閱讀經驗，高爾基與屠格涅夫應該是瞿秋白所謂「多餘的人」的來源，「多餘的人」是在十九世紀末俄國文學中的「典型」人物。參見 Maksim Gorky, *The Spy: The Story of a Superfluous Man* (New York: B. W. Huebsch, 1908); Ivan Turgenev, *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16)。更重要的，當然是瞿秋白對高爾基與屠格涅夫都做過深刻的研究。瞿年輕時剛剛抵達莫斯科，因肺病進療養院後，對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羅亭極其喜愛，曾自稱「中國之『多餘的人』」。另外，瞿對俄國文學的大量深入研究，也可以佐證。參見陳相因：〈「自我」的符碼與戲碼〉，頁101-105、126。

⑲ 關於西安事變的起因和產生的歷史影響，參見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3-271。關於二戰期間毛澤東在延安如何加強他的政治權力，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簡體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11），頁161-312。

⑳ Frederic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32-61；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311-17。

㉑ 參見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0。高華通過檢查中共成立早期的俄式革命話題與延安時期毛澤東的政治語言，得出了類似的觀點。參見高華：〈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8期，頁39-48。

㉒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630-34、639-42；John E.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12-16。魯伊認為，這種對過去的重寫不能僅僅只被看作是對歷史的惡意操縱，這種重寫應該被視為歷史編纂的一部分。

㉓ 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155。

㉔ 楊之華：《回憶秋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68-69；陳鐵鍵：《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583-84。

㉕㉖ 陳福康、丁言模：《楊之華評傳》（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頁396-402；394-95、401-402。

㉗ 楊之華：《回憶秋白》，頁166。

㉘ 石天強：〈簡論《多餘的話》在建國後的出版與傳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4期，頁148；陳福康、丁言模：《楊之華評傳》，頁401-402。

㉙㉚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

㉛ 這樣的對比當然是有所簡化的，詳細的說法，參見Lowell Dittmer, *Liu Shao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141-74。

㉜ 司馬璐：《瞿秋白傳》（香港：自聯出版社，1962）。陳鐵鍵最早指出《瞿秋白傳》的出版令毛澤東意欲利用〈多餘的話〉來打擊「黨內叛徒問題」。參見陳鐵鍵：〈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頁23。

㉝ Thomas Kampen,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Copenhagen, Denmark: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0), 9-77。

㉞ 據陸定一回憶，「1964年，香港的國民黨雜誌，又把〈多餘的話〉登出來了」。參見陳鐵鍵：〈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頁24-25。

㉟ 陳鐵鍵：〈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頁24。這段話亦可參見〈毛主席和中央首長對叛徒的批判和關於揪叛問題的指示〉，《討瞿戰報》，第11、12期合刊（1967年9月1日），第1版；〈毛主席對大叛徒瞿秋白的批判〉，載北京師大革委會紅軍編：《瞿秋白批判集》（北京：北京師大井岡紅軍，1968），頁5，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㊱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第七卷，頁692；陳鐵鍵：〈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頁19、25。

㊲ 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載《戚本禹回憶錄》，下冊（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610-30。

㊳ 筆者同意邁斯納的界定，即毛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的觀點是烏托邦主義的。

參見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155-241。

④① 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焄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頁27-42。該文亦刊於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上冊，頁303-24。

④② 劉浦江：〈太平天國史觀的歷史語境解構——兼論國民黨與洪楊、曾胡之間的複雜糾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頁84-99。

④③ 潘光哲：〈胡適與羅爾綱〉，《開放時代》，2004年第3期，頁43。潘光哲也對作為老師的胡適與作為學生的羅爾綱之間政治、學術觀點的分歧進行了有趣的分析，指出羅「在重建史實，分析史事時，相當重視政治/社會/經濟等層面的相互作用及與歷史態勢發展之關聯何在的用心，這正是胡適向未措意之處」。考慮到戚本禹的攻擊，不難看出羅為甚麼會在平衡他作為共產黨幹部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角色時發生困難。參見潘光哲：〈胡適與羅爾綱〉，頁48。

④④⑤ 羅爾綱：〈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學術月刊》，1981年第3期，頁39：42。

④⑥ 羅爾綱：〈序〉，載《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北京：開明書店，1951），頁x。

④⑦⑧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上冊，頁289-96；334-35。

④⑨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上冊，頁297。根據麥克法夸爾的研究，江青是毛澤東誣陷著名知識份子的秘密代理人，例子有吳晗、彭真、彭德懷等。參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439-45。

④⑩ 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頁33、37、38。

④⑪ 戚本禹：〈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歷史研究》，1964年第4期，頁17。

④⑫⑬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22-27；222-36。

④⑭ Lowell Dittmer, " 'Line Strugg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2 (December 1977): 701-707.

④⑮ 羅德明直接將兩條路線鬥爭、文革與劉少奇的倒台聯繫起來，參見 Lowell Dittmer, *Liu Shao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54-100。

④⑯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51.

④⑰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205。

④⑱ 郝懷明：〈「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時的感受〉，《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頁26-30。關於戚對這一過程的回憶，參見《戚本禹回憶錄》，下冊，頁342-93。

④⑲ 關於這裏沒有討論到的細節，參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32-51。

④⑳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291-308.

㉑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下冊，頁401-403。

㉒ 這段文字在《討瞿戰報》，第4期（1967年6月21日），第1版被引用。那一期首篇文章的標題是〈中共中央《通知》是《討瞿戰報》工作的指針〉。

㉓④④ 中央首長關於討瞿工作的指示，載《瞿秋白批判集》，頁8。

④⑤⑥⑦ 參見 Gao Wenqian,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Rand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105-107; 178; 167-70。

④⑧ 陳鐵鍵：〈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頁31；《討瞿戰報》記者：〈我政法公社戰士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 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得到了廣大革命群眾的熱烈支持〉，載北京政法學院革命委員會《討瞿戰報》編輯部編：《討瞿：徹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資料彙編》（北京：內部發行，1967），頁157-59，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該書是《討瞿戰報》的選輯。

④⑨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95-141.

- ⑥⑨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50-62.
- ⑦⑩ 參見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下冊，頁605-607；〈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頁629。
- ⑦⑪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下冊，頁607。這段話在羅德明的書中被引用。羅德明在分析中引用了毛自己的公開發言，印證了戚本禹的說法。參見Lowell Dittmer, *Liu Shao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01。
- ⑦⑫ 〈周總理對叛徒瞿秋白的批判〉，《討瞿戰報》，創刊號（1967年5月6日），第1版。
- ⑦⑬⑭ 〈前言〉，載《討瞿：徹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資料彙編》，頁2。
- ⑦⑮ 如論者所言：「1963年戚本禹同志的〈評李秀成自述〉吹響了揭露一切叛徒的號角。」參見〈瞿秋白是一個大叛徒〉，《討瞿戰報》，創刊號，第1版。另參見戚本禹：〈決不允許把叛徒冒充英雄〉，《討瞿戰報》，第8期（1967年8月5日），第1版。該文摘錄自戚本禹〈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
- ⑦⑯ 筆者比較了《討瞿戰報》與中國文革研究網(www.wengewang.org)上主要的紅衛兵小冊子，它們大多有着相似的格式。
- ⑦⑰ 「討瞿簡訊」，《討瞿戰報》，第7期（1967年7月6日），第2版。
- ⑦⑱ 高華：〈行走在歷史的河流〉，<http://mj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47>。
- ⑦⑲⑳ 李寅初：〈瞿秋白《多餘的話》的版本軼事〉（2019年2月23日），騰訊網，<https://new.qq.com/omn/20190223/20190223B0G166.html>。
- ㉑ 這個常見的嫌疑人名單也被《討瞿戰報》和《討瞿：徹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資料彙編》所證實，而周揚作為瞿秋白的重要鼓吹者也被補充進去。參見本報編輯部：〈一場激烈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陸定一周揚美化瞿秋白罪責難逃〉，《討瞿戰報》，第8期，第2、3版；《討瞿：徹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資料彙編》，頁123-25。
- ㉒ 〈瞿秋白是一個大叛徒〉，第1-3版。
- ㉓ 〈徹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第1版。
- ㉔ 〈從假革命到反革命——評大叛徒瞿秋白的自白書《多餘的話》〉，《討瞿戰報》，第5、6期合刊，第1版。
- ㉕⑳ 白堅：〈兩個叛徒一個面目——對《李秀成自述》和《多餘的話》的幾點剖析〉，《討瞿戰報》，第11、12期合刊，第3、4版。
- ㉖ 〈可恥的供狀——揭發大叛徒瞿秋白在獄中對反動記者的「談話」〉、起灼：〈瞿秋白的死與李秀成何其相似！〉，《討瞿戰報》，第3期，第3、4版。
- ㉗ 〈帝國主義的應聲蟲和辯護士——批判大叛徒瞿秋白對義和團運動的污蔑〉，《討瞿戰報》，第2期（1967年5月20日），第3版。
- ㉘ 〈瞿秋白的骯髒靈魂——瞿秋白給王劍虹、楊之華的信摘錄〉，《討瞿戰報》，創刊號，第4版。
- ㉙ 〈周總理對叛徒瞿秋白的批判〉、〈瞿秋白是一個大叛徒〉，第1版。
- ㉚ 〈瞿秋白給郭沫若的信〉，《討瞿戰報》，創刊號，第4版；本報記者：〈郭沫若同志談叛徒瞿秋白〉，《討瞿戰報》，第4期，第2版。
- ㉛ 本報記者：〈郭沫若同志談叛徒瞿秋白〉，第1-2版。相關內容在李琴蘭：〈從郭沫若同志的回憶看瞿秋白的醜惡靈魂〉，《討瞿戰報》，第20期（1967年12月20日），第2版又被再度提到。
- ㉜ 沈雁冰：〈為《討瞿戰報》提供之點滴材料〉，《討瞿戰報》，第19期（1967年12月9日），第3版。
- ㉝ 瞿秋白：〈多餘的話〉，《討瞿戰報》，第5、6期合刊，第4、6、7、8版。
- ㉞ 石天強：〈簡論《多餘的話》在建國後的出版與傳播〉，頁149-50。筆者的朋友叢小平年輕時第一次閱讀了〈多餘的話〉。她告訴我當時讀完之後，馬上斷定瞿秋白決不是叛徒。高華也有類似的經驗，參見高華：〈行走在歷史的河流〉。